

“我现在很想念你”

孔明珠

我一直以为父亲孔另境从没有写信给我过。从出生起我一直在他身边，读小学时他在我的请假条、成绩单上签过字。父亲的字很好看，排列整齐，微微倾斜。我保留着一张父亲的报名照，背后有一个孔字，我以为那是他留给我仅有的墨宝。

前两个月我们兄妹在四川北路老家碰面，三姐突然拿出一封信给我说，喏，爹爹写给你的。这让我有点心惊肉跳，不会是遗嘱那样的东西吧，怎么会隔四十多年才给我。我提着一颗心在哥哥姐姐们面前打开，确实是父亲的字迹，正反都有字，受过潮的缘故，字迹洇得有些模糊。正面是父亲写给我一个人的，反面是母亲写给我与三姐两个人的。

写信的年份不用考证，1972年3月16日早晨我首次离开家去郊区奉贤星火农场务农，同年9月18日父亲去世。父亲在信尾签下“父字”，紧接着的日期是5月25日。

展开信看。“明珠儿：你的23日来信今天上午收到。”父亲你竟然真的写了信给我，脑袋轰轰地响。我独自低头看信，大姐朝我吩咐道，读出来，大家听听！仿佛是三哥把信拿过去读了，我没听，只回味刚才看到父亲写的七个字“我现在很想念你”，反反复复我在想这七个字，有点像情书吧，爹爹，你真的很想念我吗？我临走的时候，你不是对我很失望吗？你躺在藤躺椅上，告诉我，自己就像

一支蜡烛，已经快要熄灭了。接着你低下了头不看我，你是知道的，事情已无法挽回。户口被我拿去迁走了，行李已打包提在手上，17岁的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怔愣了几秒钟，我还是转身下楼，关大门前把门锁舌头别上，家里只留了不能行走的父亲一个人，万一人来了。

父亲写道，我走了之后，三哥从江西回家探亲，刚送走，二姐带着两个孩子从新疆也回家过，也走了。接着父亲与我谈起了保姆的事：“这次用的保姆，相当能干和活泼，和以前的胡大姐仿佛。来时说定上半天，每月十元，她做了几天，为了增加她工作兴趣，我要她来我家吃早饭，不收她钱，也不要粮票。哪知她‘得陇望蜀’，她今天又提出说从前的老东家要她去做，上午7-11,下午再去做二小时，一共给她15元。现在我们还没给她回信，我的意思满足她要求算了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我家父母双职工，孩子多，一直请保姆帮忙做事，直至十年动乱父亲只拿生活费，一切开支都紧缩。哥哥姐姐和我都学会做家务，潦草支撑过来。可是现在我也要走，留父亲一人生活不能自理，只能再次去找人帮忙。世道变了，做熟的老保姆们是找不到的，我临时找了个弄堂口卖冰棍兼为人家洗衣服的女人来，那个女人做事稀里哗啦，脑子不好，父亲不满意。信中说的新保姆“能干与活

的人们……

我走到哪里都带着电脑，像处于备战状态，对照着眼前的每一帧不协调的景象，反复修正着我那个未完成小说的主题，不仅仅是两个残缺家庭六个伤心人的故事了，我还有更复杂的寄托。但一直写得结结巴巴，偶尔高昂大半消沉，终于，在14万字处卡壳、僵死。我感到这篇小说要完蛋了，要成废纸一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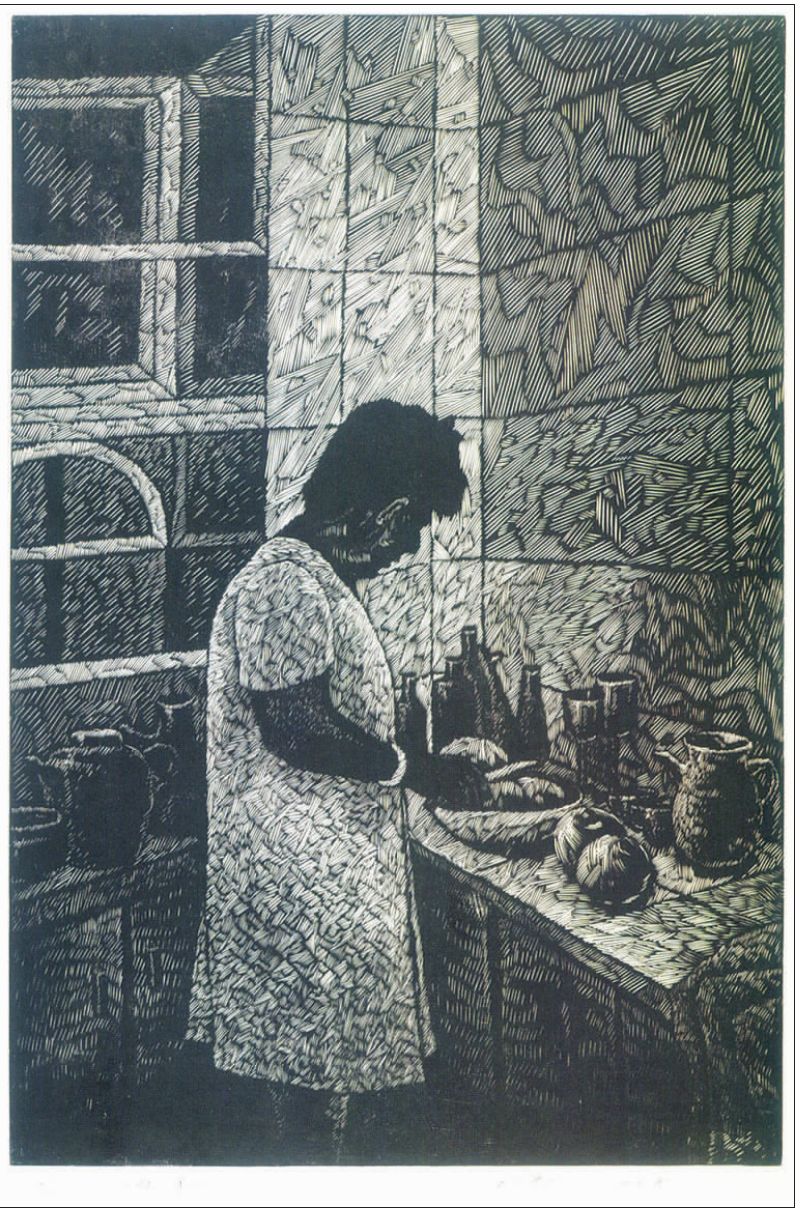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晚上，我到迈皋桥广场散步，露天卡拉OK如同前面任何一天一样扎堆开张，带着城郊结合部特有的纵情，夜色中，面孔模糊的人们穿着看不出颜色的衣服，在快活地唱歌——我仍住在迈皋桥一带，从地产商角度来看，一个很不漂亮的区位。在此之前，我跟随父母在厂区一带居住，对大厂宿舍区的那种苦中作乐、所求不多、得到便好的气氛，有种乡愁般的感情。我记得那些燥热的夏季黄昏，大家住地面上泼水降温。疲惫了一整天的人们在街面上支起不大平整的桌子，开始他们一日之尽的晚餐，器具不美，菜粗量大，少不了会有几杯辣嘴的烈酒。迈皋桥周边，至今也有着这样一种因陋就简的气息。我喜欢看到这随意到仿佛毫不重视的晚餐。这样的晚餐是歇息和适意的，在心理上有着对彼此的依偎与投奔，密布着食物之外的各种味道，可堪默然咀嚼，可堪吞咽饱腹，就像梵高的《吃土豆的人》——乏善可陈的房间，清冷不明的灯光，土豆冒出来的团团热气中，互相探询着的那些变形的脸。我从第一眼就喜欢这画，它像是多年来我一直在竭力寻找的陌生人。我带着盲目的热切想着，既然不能坐到这幅画里，跟他们一起以手取食那些热乎乎土豆，那起码应当为它写篇小说吧。多年过去了，我想这本《六人晚餐》可以算数。

电影《六人晚餐》里，丁成功毫发无损地活着呢，并且还实现了他与晓蓝的爱情，他们如踏云雾般地跃入了“美好生活”。也许观众需要睡前故事？需要带着甜味剂进入梦境？

我说服自己接受电影的别样处理，就好比安迪·沃霍尔的丝网印刷作品。有一大家子人，码头上倚着栏杆合影，风吹得他们头发乱七八糟。沃霍尔对这张平淡无奇、套印不准的褐色家庭小照进行了戏谑化的几何复制，直至它们横平竖直地排满整个画面，形成一种呆板却又时光飞逝的效果，像大部分的家庭生活，被疏离，被复制，野草一般——影片的明媚结局与小说的黯然残缺，也许正是不同角度的折射与假设吧。我们看到野草的秋萎冬枯，也要看到它的春来摇曳。



泼”，看来父亲是喜欢的，为了拉拉拢人心，还邀她来吃早饭。你看看，老人家怎么弄得过能干与活泼的阿姨啊，要加工资。父亲当时退休工资被割掉一半多，医药费报销也没能恢复，拮据得很。可是，找到一个称心的保姆不容易，父亲忍痛求全准备答应新保姆的要挟，与小女儿商量是假，求安慰是真。父亲一向是个果断的人，他在家里是掌管财务的大亨，多花点钱从不与母亲商量，可他在信中那么温柔地问我“你以为如何”，他是真的想我了。算起来父女俩从1970年4月我小哥哥去江西插队落户后，相依为命两年，经常吵吵闹闹，每次妈妈从“五七干校”回家探亲，他都要向母亲告我的状，管我叫



母亲
(木刻)
徐青

书间消息

若合符节：久石让与宫崎骏

邹 经

古代的文类，远比我们现在丰富得多，《文心雕龙》中提到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檄、移等，各有各的创作原则，多是为了配合某些实际的目的，但同时亦是文学，可念可诵。颂用以祭告神明，要求是典雅美善；移文则用于意欲归顺的人，它和檄文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效力之大，所谓“移实易俗，草偃风远”；古人相信文学的力量。

这些文类，虽然不再被广泛提及，但是对其功用的诉求，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没。我们走在一条现代化、多元化，从而引起价值混乱的道路上，在某些方面却产生了僵固的偏见，高举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人往往瞧不起应用写作，其结果是，纯文学的创作曲高和寡，而但凡演讲、公文，甚至书信、日记，多不忍卒读，枯燥乏味。

音乐领域，何尝不是如此。久石让在《感动，如此创造》（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）一书中自承：“与现在相比，我年轻时更加死心眼，所以也就没想过街头音乐家与极简音乐创作可以并行。”在这里，“街头音乐家”代表的是一种接受度更高、可以拥有更多听众的音乐；而“极简音乐”（minimal music），是从渐趋复杂，失去节奏的古典音乐中反叛出来的现代音乐。在芸芸大众前，越是高深的艺

“西小句（死小鬼）”。

“我现在很想念你，不知你大概何日可回家休假，我估计总在端午节边吧？”此时我离开家已有两个多月，尽管妈妈已经从干校被调回上海，三哥与二姐都来看过他，等母亲去书店上班，家里空无一人时，父亲想我了。他是回忆起我们俩在一起时互相的默契吧？想起我做饭菜的可口，想起我端上洗脚水的合适温度，想起我们拌嘴时我来一句顶一句的机灵吧。这些，有谁能替代？洗衣大姐不用说，活泼能干的新阿姨要涨工资啊，真扫兴。

“文献”至今无下文，真急死人！”文献是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，我父亲生前最后的单位，至今无下文是指落实政策恢复退休工资以及报销医药费的事。父亲的手头拮据已久到灰心丧气。“万一保姆走了，不知如何活下去！”“你替我想想看！”接连两个感叹号。

最后：“你千万要注意健康，多用点钱不要紧！可常来信。”这就是50岁时生我的老父亲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。我把这封信放入包中，一路上紧紧地夹住它。回家后我再不敢打开，我很害怕这是一封假信，很害怕“我现在很想念你”那七个字逃走。父亲！

童年，我活动的范围很小，每天上幼儿园，到后来读初小，经过的那几条街巷，成为永久的童年画面。虽然算是市中心，几幢高大的民国建筑背后的寻常巷陌，手艺人特多：裁缝，弹棉花的，木匠作坊，箍桶匠，补锅匠，铜匠，铁匠铺……简直应有尽有，儿童眼中，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活，各种手艺活，各种特别的工具，都吸引过我。六十多年过去，几回重走旧街，面目全非：高楼林立，遮天蔽日；举目尽是广告，也有小店铺，多为快餐店和房屋中介；而且，时时得提心吊胆地防着汽车、电动车和摩托。——不知读者有没注意到：现在极少有小孩子独自在街上走，而当年四五年级的孩子能走好远。

我五岁时独自上幼儿园，大约要走七八百米，经过两条巷子，上“国府路”。下午四点幼儿园放学，我慢慢走回，一路看热闹，虽然不是每天都有“稀奇”，但在儿童眼中，那就是整个世界了。再说街巷没什么车，偶尔有辆汽车开进来，那才算“稀奇”。那年月，南京街头马车很多，有拉货的，也有载客的。幼儿园就包过马车去东郊春游，每辆马车能坐近二十个小朋友，我们都很听话，从没发生从马车上摔下的事。那种敞篷马车，后来在欧美见过，好像没我小时见过的宽大，不过，也许是我那时个头太小了。因为马车多，街巷里就有马掌匠。我五六岁时，经常去看马掌匠给马钉马蹄铁，那“量蹄定做”的过程在我看来很慢，要等好一会儿；做好了，再次用绳子把马腿别起来，掌钉子。我总觉得把马蹄铁钉在马掌上惊心动魄，该有多疼痛，但不知为什么马并不哭喊哀求。钉完四蹄，主人牵着马离开，走在小巷潮湿的路石上，新马蹄铁声的达达，犹在耳边。

马掌匠只做马掌，也不是每次去都能看到钉掌。我更愿意去巷口铁匠铺看铁匠打铁。师傅从炉膛里钳出火红的铁块，放在铁砧上敲打；师傅用小锤，帮工用大锤，叮叮当当，有节奏地响个不停。小锤双击停下，师傅把器件举起来就着炉火端详，脸上映出一片火红，尔后又放进炉膛，钳出一块，继续打。如果看看差不多了，就把器件放进水中淬火，滋啦一声，热气升起来，小铺子一片白汽。我小学毕业时，铁匠铺还在。那师傅大约有五十多岁，举大锤的帮工面目不清，应当年轻一些，只记得大冬天也只穿着个背褡，露出红铜色的胳膊。成年后看健美比赛选手的照片，亮出的那些肌肉，未必有多美；但我会因此想起童年时见过的抡大锤的铁匠帮工，在那叮叮当当的铁砧边，炉火映出的油黑的脸庞。现今的肌肉男子多是健身房器械练出来的，他们不会打铁。我教书多年，很多学生虽然常用“锻炼”这个词，却不知本义，更无从想象炉火映照的劳动场景，因为他们没见过铁匠铺。当然，我也不如精疲力竭的铁匠能深知“千锤百炼”的意思。

小时候，我们把理发店叫“剃头店”，街角剃头店老板姓孙，一想起他，耳边仿佛响起他的咳嗽声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记得他的习惯，总是咳嗽，戴个口罩，也许是怕唾液喷到顾客脑袋上。说是“老板”，也就他一个老头，连个帮工也没有；街角一间小屋，七八个平方，一把老式的理发椅，门口也没有旋转的三色灯箱。孙老板靠一把推子一把剪刀养活全家，他肯定满怀希望——独女儿考上了中专，以后会有好的工作，成为“公家人”，街坊恭维孙老板，往往是这个话题。他剃头，慢吞吞的，还不让人动

吴非

铁匠和理发师

弹，我稍稍想活动一下手脚，他就在我脑袋上敲一下“别动！”我上课时七八分钟还能动弹两下，老师看不到；但孙老板不准我动弹，令我心怀恐惧。每次剃头要等一个小时，因为他的慢条斯理，每个人要剃二十分钟，这对我简直如同受刑。但不知为什么，街坊都爱到他那儿排队去受罪，也许就是来享受他的“磨功”的。后来我上中学，学校有理发室，剃头五分钟，真爽快，从此摆脱孙老板。中年，常去附近一家国企的理发室，速度创纪录，最快的一次，三分钟搞定，这让我很开心。但由此也感慨：那个孙老板没过上好日子，他一天顶多剃20个脑袋，儿童五分钱，成人一毛钱，从早到晚站着，累得要命。现在，我常常想起他，他其实可以动作快一些，即使不为多挣钱，也能多休息；然而，也许他做徒弟时，师傅就是这么教他“顶上功夫”，慢功出细活的。

铁匠，理发师，还有更多的匠人，劳作的人，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。绝大多数被称作“普通百姓”的人，就那样过着平凡的生活。底层手艺人的平凡，未必磨灭劳动趣味，收入的微薄也未能腐蚀匠人的诚信。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在工作台前手工制作器物，有人终身敲敲打打替人修修补补，有人一生耗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更多的人在种地，祖祖辈辈的汗水滴在同一块地上……只要没有剥削没有压迫，只要人能保持自由意志和劳动的愿望，所有的行业都是平等的。劳动者爱自己的行当，在于领略职业意趣，在谋生的同时，逐渐认识劳动的精神价值。

在欧洲旅行，特别爱看老街上精致的小店铺：裁缝戴着眼镜安静地制衣，理发师从镜子中端详客人的发式，食品店员把架子上的火腿摆得像仪仗队，穿戴整洁的面包师从老式炉膛中取出烘焙好的糕点……鞋店师傅小心翼翼地在皮料上画线，让我想起《品质》中的格斯拉——高尔斯华绥笔下的那个宁可穷饿而死也不愿意粗制滥造的靴匠。他们劳动时神情庄重从容，也让我想起陪伴了我童年的铁匠和理发师。

矛盾的事物之间保持着柔韧性、弹性。如果说克里斯托弗·诺兰的《蝙蝠侠：黑暗骑士》让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讨论失去意义，那么，久石让终于能把现代音乐创作与街头音乐家搅拨了分开，分开了捏拢，于是，他的困境也被打破了。

他在《束缚住自我的“羞耻感”》中写道，自以为“这种庸俗的事我做不来”，这种想法本身不就是高高在上，用一种轻视的目光鄙视他人吗？正是这种想法对自己造成无谓的束缚。他主张尽量多接触一些事物，扩展自己的包容力。身为作曲家、钢琴家兼指挥，这几个身份并不像文字的表面看上去那么风平浪静。久石让不断地追逐自己的音乐梦，从中发现乐趣，但他不会假惺惺地告诉我们他一直很快乐。他坦陈自己从接手工作到最后完成整个过程经历的情绪起伏——看过毛片、与导演讨论过后，作曲家努力做出好声音，交给导演试听，如果导演提出修改，心情会稍微低落。“即使低落，仍要振作起精神创作乐曲”，但在录音时，碰到的乐手不能百分之百再现自己脑中的乐曲时，“这会作作曲家感到有些泄气”。最后将配乐与画面合在一起时，听到配乐被掩盖在电影台词和音效之后，情绪又会从最初的兴奋一路往下跌落。

看到大师这样描述自己的小情绪，不禁莞尔。但是，久石让之所以成为久石让，正因为有在有着这些情绪时，他还能够“借助制作电影时人与人的合作关系，可以看见自己未曾想过的方向，展开另一个全新的世界……自己的世界会因此而倍加辽阔，变得更为丰富”。他认为，这是与人通力合作的好处。我想，这或许正是艺术世界小乘和大乘的分野。